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开放发展观^{*}

凌永辉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210093)

内容摘要: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篇富含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议题的大文章,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开放发展观。基于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属性,系统阐述新发展格局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新开放发展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开放发展新理念、重要经济学维度以及重大意义。研究表明:构建新发展格局同马克思的资本循环与再生产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理论一脉相承,因而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它又有着区别于过去发展阶段中旧开放发展观的新理念,包括制度型开放、国内市场规模优势、高水平自立自强、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统筹发展与安全。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开放发展,要从层次、领域、范围、空间和次序五个重要维度进行拓展和协同推进。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开放发展观,对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经济思想; 新开放发展观; 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0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23)04-030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3.04.002

自 2020 年 4 月提出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二十大等重大场合多次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重要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而做出的战略决策,是关乎人民福祉和民族复兴的长远谋划。但是在实践中,对于新发展格局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其中最典型的两类表现为:一类是只讲国内大循环,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实行闭关锁国;另一类是只讲国际循环,固守过去那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显然,这两类认识都不是对新发展格局的全面理解。从根本上讲,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循环与再生产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理论一脉相承,又具有区别于过去发展阶段中旧开放发展观的新理念,对我国当前及未来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收稿日期:2023-3-12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项目编号:21ZDA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凌永辉(1989—),男,安徽歙县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结构、组织与政策研究。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一、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分工,同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产业纵向或横向关联以及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高全球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能力,争取自身在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从而更好地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连通、相互促进。这内在地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循环与再生产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理论。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虽然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①由此可以断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新开放发展观的高度凝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最新成果。

从学理上讲,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生产要素流动和利用实现循环畅通。这样的国民经济循环系统反映了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本循环本质,并且表现为社会再生产不断进行,社会总产品不断实现的过程(陈甬军、晏宗新,2021);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资本又具有突破民族国家地理界限进而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宋宪萍、孙茂竹,2012)。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②因此,随着资本循环和社会再生产的持续实现,国民经济就有可能从国内循环进一步向国际循环扩张,形成世界市场和国际专业化分工。

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③,用公式表示就是: $G-W(A, P_m) \cdots P \cdots W'(W + w) - G'$ 。从这种循环运动中可以看到,“资本表现为这样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④。可见,货币资本的循环($G-W \cdots P \cdots W' - G'$)对应了购买的职能形态,生产资本的循环($P \cdots W' - G' - W \cdots P$)对应了生产的职能形态,商品资本的循环($W' - G' - W \cdots P \cdots W'$)对应了售卖的职能形态,这三种职能形态不仅在时间上先后继起,而且在空间上保持并存,共同构成了产业资本的全部循环模式和社会再生产的微观基础(张方波,2022)。这样,国民经济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众多部门才能实现分工有序、彼此支撑,国内大循环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也才能实现畅通运转。

然而,在上述资本循环中,可能存在三种受阻情况:第一种出现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由于货币供给减少,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的质—量矛盾,因而货币资本循环就会出现积累中断;第二种出现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当出现利润率下降且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本所有者的生产意愿进一步下降,进而导致生产缩减;第三种情况则是商品资本循环中,存货过多、生产过剩而导致资本所有者向下调整产量(宋宪萍、梁俊尚,2014)。马克思强调:“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 $G-W$ 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

① “四个全面”擎宏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18))——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N]. 人民日报,2021-08-11(05).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8.

③ 资本论(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9.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

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 $W'-G'$ 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碍”。^① 这就意味着,当前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堵点、断点,实质就是“惊险的跳跃”不成功的结果,并在宏观上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累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在微观上表现为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高质量供给不足等问题。

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② 这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的资本循环与再生产过程也同样适用。从资本发现到生产再到占有新的经济空间,其实就是资本的不断增值和再生产过程(李震等,2021)。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发现和资本创造并进而占有新经济空间的能力将不断提高,有助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空间分割,从而有力推动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胡博成、朱忆天,202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 这表明经济发展天然具有空间需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国内循环可能无法支撑新的商品 W' 到新的资本 G' 跳跃,于是就有了转向国际循环的需求。由此,无数个国际循环交叠推动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张占斌,2022)。近现代以来,科技革命不断演进、世界市场持续扩张、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等(陈甬军、晏宗新,2021),均反映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彰显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理论。实际上,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产品间分工、产品内分工不断加深我国与全球各主要国家的产业纵向或横向的关联以及相互依赖程度,国内和国际市场早已密不可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片面意义上的国内封闭循环,也不是片面意义上的国际循环,而是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有利于澄清理论界对新发展格局认识上的误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二、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发展新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变化而做出的战略决策,具有深刻的实践基础。从我国的开放发展历程来看,过去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融入国际循环,形成的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格局。但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旧发展格局越发式微,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开始更多地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大循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生动摇,而是强调通过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来最大化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而促进全球要素资源的整合创新,最终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构建新发展格局从以下五个方面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开放发展新理念。

(一) 制度型开放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研究认为,制度型开放可以从历史、现实、国际和国内四个维度进行认识,即确保我国对外开放大战略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强调对各个经济领域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提升国内规则对境外的正向溢出效应,实现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有机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从这一内涵的理解和认识来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5.
③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1.

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制度型开放的条件和环境。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分行业和分地区优惠的外贸政策已基本取消,使得外贸政策和法律法规统一透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实施,也使得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有了法律保障,而且政府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和优化营商环境,初步形成了符合多边体制要求的管理体制框架(江小涓,2019)。目前,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比如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方面,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在引领国际经贸规则方面,已经同 149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截至 2022 年 7 月)^①。上述分析表明,实施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要推进制度创新,一方面使国内政策规则统一和标准一致,破除国内市场进入壁垒,平等各类市场主体的竞争条件,实现国内外贸易一体化;另一方面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贸规则更加相容,逐步形成有利于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二)国内市场规模优势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②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其实就是利用内需引致型创新、累积因果循环和要素结构优化等效应^③,扩大专业化分工、加快本土技术创新,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性和竞争力。也就是说,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意味着国内市场可以向内和向外集聚创新资源。一方面表现为高水平地引进来,即利用国内市场提供大量的发展机遇来吸收全球人才、知识和技术,在国内聚集起巨大的创新要素,从而可以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的差距;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大规模地走出去,即推动我国品牌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推动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从而就地利用所在国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中国企业发展创新经济服务。对我国而言,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是应对经济全球化逆流和产业技术变革的有力凭借和重要手段,但也需清醒地看到,人口众多和国土广阔只是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众多维度中的两维,它还包括了市场分工、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需求水平、高水平供给能力等其他维度(杨虎涛,2022)。因此,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不会自动产生,而是需要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有机结合,不断促进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增加、市场分工水平深化、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向好、产业链创新链相互协同,最终才能培育形成的。

(三)高水平自立自强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④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面临巨大约束,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发凸显。面对发达国家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等挑战,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际上,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相当大比例的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均来自本土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因此,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既强调主要利用本国的市场和要素进行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也不能忽视在开放中参与全球创新链分工,在这种分工合作和竞争中实现高水平自主创新。这不仅是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的关键,而且也是促进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当今世界,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变革,决定了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在空间上进行模块化分离,而分离的模块越多,就越可能使不同的生产环节被跨国公司分散布局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

①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②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 2021(09).

③ 在本文语境下,内需引致型创新效应是指本土企业通过内需容量所蕴含的引致创新作用,内生地培育和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累积因果循环效应是指内需通过国内市场效应引致现代部门在本地形成产业集聚,而现代部门的产业集聚又反过来促进内需增长;要素结构优化效应是指各类要素从传统低效率产业或部门重新配置到现代高效率产业或部门,从而促进现代高效率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④ 同②。

的产业组织载体可以是以我为主的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即在内需主导型战略下依靠超大规模内需建立起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凌永辉、刘志彪,2020)。在这种组织机制下,利用庞大的内需作为粘合剂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畅通循环,实现市场资源开放利用的自我控制和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掌控全球产业链的全部关键环节,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靠封闭完成产业链中各种复杂的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扩张活动(刘志彪,2022)。

(四)包容性经济全球化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重大场合上都积极呼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科学主张和重要倡议,着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①。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古典的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比较优势得以彰显,促进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自由化等,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另一类是现实的看法,强调经济全球化虽然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但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全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尤其是会对低技能劳动者造成严重的失业冲击(佟家栋等,2017)。之所以产生上述对立观点,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对包容性增长的忽略。所谓包容性增长,指的是一种能促进机会增加且机会平等获得的增长。这种理念有助于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从量转到质上来,即关注增长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以及产生整体质变的可行性(叶初升、张凤华,2011)。也就是说,包容性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共赢共享和可持续发展,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譬如,我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一个延伸最广、规模最大的欧亚大陆经济合作平台,正是倡导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的生动实践。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一带一路”不是仅满足资本的纯粹空间扩张需要,而是强调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通过寻找到认识的相通点、参与合作的交汇点、共同发展的着力点来让更多地区收益;二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全球公共产品,为沿线国家提供实现摆脱贫困和现代化的新路径选择,分享中国式减贫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三是“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主张在维护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强调平等参与、平等交往、共商共建共享。

(五)统筹发展与安全

发展和安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辩证统一: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首要前提,只有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才能真正地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重要保障,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刘志彪、凌永辉,2021)。因此,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过去长期以来,我国利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主要聚焦的是“发展”的价值取向;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遭遇了一系列不利冲击(如全球化逆流、新冠肺炎疫情等),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呈现出纵向分工缩短、横向分工区域化集聚的普遍内向化现象,深刻地反映出安全价值取向强化趋势。实际上,“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②。这就把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安全问题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发展和安全的双重价值取向,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不仅需要推动经济循环畅通运行,而且需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譬如,针对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许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就要充分运用超大规模国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交出版社,2020:202.

^② 习近平.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1-01-12(01).

内市场的绝对优势、完整工业体系的相对优势以及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建立起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即“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在极端情况下能够正常运转”^①。

三、新发展格局下拓展高水平开放发展的重要维度

当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经济内外循环可能会遵循“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向内向外集成创新资源→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重塑,其核心本质是整合国内国外各类资源要素为己所用,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②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新开放发展观的鲜明体现。其中,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但目前仍存在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纵向或横向政府治理因素,如直接控制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流动和配置,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外地企业竞争等。如果不能有效消除这些阻碍因素,那么我国国内市场就一定是分割的、封闭的、垄断的、无序的,将很难形成向内向外集成创新资源的“向心力”。如果没有国内国外创新资源的支撑,那么我国产业体系内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就不可能实现协同,进而产生诸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才能形成促进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持续性不断增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而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由此,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开放发展,至少需要沿着以下五个重要维度重点推进。

(一)在层次上:从要素型开放拓展到制度型开放

我国过去的开放发展格局,最主要的特征是渐进式推动商品、服务、资金和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众所周知,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民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的占比很小。1950年至1978年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不仅比较低,而且还从0.89%下降至0.76%(倪红福,2022)。而在改革开放后,我国打开国门,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商品、服务、资金和人才等要素才逐渐流动起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扩大了在各产业各部门的对外开放程度,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要素流动型的开放已经不足以适应和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新时代发展要求。一方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外部市场需求的能力日益减弱,近年的全球化逆流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发达国家已无法容纳我国的超级产能供给,而且它们对于经济发展演化的一些基本立场也在发生改变,试图通过制造业回归、制造业出口倍增计划等“再工业化”手段,谋求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回流”;另一方面,我国过去主要的比较优势在于低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禀赋,但近年来这些传统要素的偏低价格正在发生补涨,使一些标准化、模块化、同质性较强的国内中间品供应商很容易被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外中间品供应商(如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代工企业)所替代,导致全球产业链出现“中低端分流”的重构趋势(刘志彪、凌永辉,2021)。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和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固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其中关键在于,通过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实现规则和效率的帕累托改进。

^① 习近平.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N]. 求是,2020(21).

^②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20-11-04(02).

(二)在领域上:从制造业开放拓展到服务业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出口导向条件下对外开放的产业重心选择主要为制造业,通过嵌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本土制造业产能迅速提高,且以出口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因而出口导向条件下的对外开放基本是制造业的对外开放(巫强等,2011)。反观服务业,一是服务贸易长期为逆差,而且近年来呈现持续扩大趋势;二是像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在吸引外资的比例方面也十分有限(凌永辉、刘志彪,2018)。这反映了我国服务业在过去的发展格局中对外开放的程度远低于制造业。这其中的一方面原因是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各自属性差异,即服务业产品多具有无形性,且生产与消费具有同时性,导致服务贸易开展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开放发展方式,主要为全球价值链上制造业外包的接包者角色,承接生产加工组装等制造环节,而本土服务业很难融入这种出口导向下的产业分工体系。当前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要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深入实施“以我为主”的经济全球化(刘志彪、凌永辉,2021),内在地要求在继续扩大制造业、农业领域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重视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韩保江,2020)。扩大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激活国内服务业市场和带动国内服务企业深度融入国际市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消费需求,而且因为服务业开放更多的是规则、标准或制度方面的国际对标,这些变化能够有力促进和引领相关领域的开放,从而助力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夏杰长,2022)。

(三)在范围上:从对外开放拓展到对内开放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发展阶段,开放发展的范围要从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对内开放进行拓展。其理由有二: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导致经济全球化发生深刻重塑,西方发达国家构筑“小院高墙”企图阻碍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如芯片断供、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我国继续以过去的出口导向方式扩大对外开放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潜力尚未充分转化为现实竞争力,消费需求“四个比重偏低”的结构性短板不容小觑^①。这必将制约我国国内大循环的形成,不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亟需构建高水平、高标准和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对外开放向对内开放积极拓展开放发展的范围,实施对内对外的一体化联动改革和开放,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要素市场化流动和配置等。唯有如此,才能通过分工深化和产业协同的加强促进投资需求提升,才能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类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只有使前者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与后者所蕴含的实际工资增长保持同步,才能使国内市场真正地形成良性循环以及由此内生的国家竞争优势。由此也不难预见,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推进,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我国国内市场将激发对全球创新人才和资源的“磁吸效应”,从而成为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中一个重要的“磁极”,不仅能有效拉动我国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能进一步凸显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在空间上:从向东开放拓展到向西开放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发展格局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向东开放。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国最先实施开放的城市是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五大经济特区,进而陆续扩大至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方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全国制造业和要素资源的主要集聚地。二是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对象主要面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

^① “四个比重偏低”,即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的比重偏低、居民消费支出相对于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偏低、乡村消费需求相对于城镇消费需求的比重偏低、居民消费需求中服务性消费的比重偏低。

直接投资,同时也向这些国家出口了大量的制造产品。过去几十年来,通过深入推进向东开放,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均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向东开放模式的过度倾斜在客观上造成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引发了一系列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譬如,长期依赖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不仅容易导致我国本土企业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陷阱,而且由于“马太效应”造成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地理区域和生产配套优势越来越强,而中西部地区发展资源逐步被“抽空”,导致国内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加快重塑我国开放发展的空间布局,从向东开放拓展到向西开放。同向东开放的含义相对应,向西开放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把我国相对闭塞的中西部地区推到对外开放前沿,通过加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推动资源要素的“逆向集聚”和产业梯度转移;二是利用“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区域合作框架,提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水平和层次,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显然,从向东开放拓展到向西开放,其实质是要实现多元性、全球性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而全方位提高我国经济在全球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

(五)在次序上:从自上而下式开放拓展到自下而上式开放

纵观我国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可以按照特定的重大事件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例如,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1978—1991年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的初步探索阶段;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为标志,1992—2000年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格局的基本形成阶段;以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2001—2012年是我国全方位开放发展的新阶段;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标志,2013年至今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全面开放发展新格局的阶段(权衡,2018)。从中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比较典型的“自上而下”不断推进的特征,即由政府主导、政策协同推动的市场渐进式开放发展过程。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其最终目的是政府在市场成熟起来以后逐步从微观经济竞争领域退出,转向公共事务领域,从而实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吴敬琏,2011),这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目标具有一致性。因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及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高水平开放发展,要以构建高水平、高标准和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充分激发市场微观主体在开放发展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市场主导、社会参与、政府协同的“自下而上”式开放发展。

四、新发展格局下践行新开放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②我国经济的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立足我国具体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着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而且更具备中国发展特色。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践行新开放发展观,既要求吸收各国现代化“一般性”经验,也要求强调中国国情“特殊性”,从而实现内生发展和开放发展的有机统一。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03).

^②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2021(09).

(一) 有利于发挥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

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人口规模巨大。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同时也赋予了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新内涵。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在考虑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提出来的战略构想,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前提。众所周知,我国拥有 14 亿人口,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有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未来还有稳步增长空间。这意味着我国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源规模,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动力和优势所在。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目前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还存有不少的断点、堵点,人口规模巨大的潜在优势尚未得到完全挖掘。从供给侧堵点看,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存在较为明显的扭曲,不仅使社会福利遭受无谓损失,而且还会阻碍创新效率和高质量供给;从需求侧堵点看,收入分配不够合理、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社会投资回报率等问题长期存在,使消费成为从生产到新的生产这一国民经济循环中的薄弱环节。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对立统一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约束条件下,二者的作用和地位有着主次之分。但是,“在我国发展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①。这是最终实现供给与需求之间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必由之路。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路径选择,即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打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各种堵点,使得经济活动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能够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实现顺畅运转的国内大循环,进而更好地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践行新开放发展观,有利于人口规模巨大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从而为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二) 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践行新开放发展观,内在地蕴含了不仅要解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虚实经济之间等不平衡发展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市场竞争、增长动能转换、体制机制创新等不充分发展问题,其目的是助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更好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过去,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体系偏向于鼓励生产性努力,重视通过发展的办法优先把“蛋糕”做大,但也带来了一些诸如资本无序扩张、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现在高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要求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因而收入分配体系必须根据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逐步向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倾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公共福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下践行新开放发展观,更加强调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统筹,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分配体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张占斌,2022)。

(三) 有利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上了 120 万亿元的新台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接近五分之一,而且也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这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是我国物质文明建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76.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2).

设取得丰硕成果的鲜明体现。构建新发展格局下践行新开放发展观,既要求努力实现高质量、平衡充分的物质文明发展,也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二者应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①，“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②。当今一些发达国家日益暴露出的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等弊病,一些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深陷两极分化、政治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工业化、技术化、资本化以及文化变迁的现代化诸场景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出现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王淑芹、何珊,2022)。实际上,物质文明是生产力范畴,精神文明是生产关系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新开放发展观在本质上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必然有利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相互协调。

(四)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实现了现代化的跨越式积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三百年的现代化历程(王灵桂,2022)。但是这种现代化在时间上的高度压缩,再加上高排放、高能耗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也导致我国出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张状况,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造成了一定的堵点和难点。事实上,我国长期以来从低附加值环节切入全球价值链进而从事国际代工,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转移效应”带来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的增加(张少军、李东方,2009)。当前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根本上是要转变过去那种以廉价要素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发展模式,进而更加强调“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的绿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无疑将有利于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就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③因此,新发展格局下践行新开放发展观,也必须以绿色发展为基本原则之一,不断推进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等三大变革,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双循环。这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五)有利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阐明:“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④这揭示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既具有时代价值,也彰显了世界意义,必将在推动我国经济安全发展的同时,也对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包容性发展、维护经济全球化下的多边治理规则体系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目的是通过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⑤。可见,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开放发展观,有利于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以资本逐利逻辑为中心、以少数集团群体利益为核心、且充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4.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53.

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2.

④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J].求是,2021(02).

⑤ 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N].人民日报,2020-11-07(03).

满了殖民主义色彩的发展道路,而是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在谋求我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韩保江、李志斌,2022)。

五、结语与展望

本文从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属性切入,重点阐释了新发展格局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新开放发展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开放发展新理念、重要经济学维度以及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是一种抛砖引玉式的有益尝试,也是对新发展格局理论已有研究的重要补充和拓展。

新发展格局是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双循环格局,不是关起门来自我运行的封闭格局。这种“双循环”属性同马克思的资本循环与再生产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理论一脉相承,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但同时它又有着区别于过去发展阶段中旧开放发展观的新理念,这主要体现在新发展格局对制度型开放、国内市场规模优势、高水平自立自强、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统筹发展与安全五个方面的强调上。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高水平开放需要从五个重要维度进行拓展:一是在层次上从要素型开放拓展到制度型开放,二是在领域上从制造业开放拓展到服务业开放,三是在范围上从对外开放拓展到对内开放,四是在空间上从向东开放拓展到向西开放,五是在次序上从自上而下式开放拓展到自下而上式开放。由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践行新开放发展观,也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有利于发挥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利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最后需要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韩保江,2022),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①。毋庸置疑,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篇富含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议题的大文章,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开放发展观,其内容和内涵博大精深。未来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理论、经济战略和政策实践都将面临发展和创新的一系列重大任务(黄群慧,2021)。□

参考文献:

1. 陈甬军,晏安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实践创新[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37-47.
2. 宋宪萍,孙茂竹.资本逻辑视阈中的全球性空间生产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6):59-66.
3. 张方波.双循环中的金融资本空间化:叙述逻辑、历史考察与理性回归[J].财贸经济,2022(07):103-117.
4. 宋宪萍,梁俊尚.基于资本循环框架的金融化与空间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89-102.
5. 李震,昌忠泽,戴伟.双循环相互促进:理论逻辑、战略重点与政策取向[J].上海经济研究,2021(04):16-27.
6. 胡博成,朱忆天.从《资本论》到新时代: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214-224.
7. 张占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01):16-26.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思路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02):125-135+148.
9. 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J].管理世界,2019(12):1-16+103+214.
10. 杨虎涛.市场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J].华东经济管理,2022(09):1-10.

^① 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N].人民日报,2020-11-25(06).

11. 凌永辉, 刘志彪. 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J]. 经济学家, 2020(06): 26-34.
12. 刘志彪. 在开放中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N]. 学习时报, 2022-10-12(A2).
13. 佟家栋, 谢丹阳, 包群, 黄群慧, 李向阳, 刘志彪, 金碚, 余淼杰, 王孝松. “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06): 5-59.
14. 叶初升, 张凤华. 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包容性增长[N]. 光明日报, 2011-03-18(11).
15. 刘志彪, 凌永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逻辑主线和总体框架[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1(02): 83-93.
16. 倪红福. 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个逻辑框架[J]. 经济体制改革, 2022(03): 5-15.
17. 巫强, 刘志彪, 江静. 扩大内需条件下长三角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战略选择[J]. 上海经济研究, 2011(10): 21-28.
18. 凌永辉, 刘志彪.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轨迹、逻辑与战略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分析[J]. 经济学家, 2018(07): 45-54.
19. 韩保江.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N]. 光明日报, 2020-12-23(16).
20. 夏杰长. 以服务业开放为主要抓手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J]. 财贸经济, 2022(10): 5-9.
21. 权衡. 对外开放四十年实践创新与新时代开放型经济新发展[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09): 3-9+135.
22. 吴敬琏. 我国市场化改革仍处于“进行时”阶段[N]. 北京日报, 2011-12-05(17).
23. 王淑芹, 何珊. 如何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N]. 光明日报, 2022-03-04(13).
24. 王灵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03): 77-96+205-206.
25. 张少军, 李东方. 生产非一体化与能源利用效率——来自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02): 66-75.
26. 韩保江, 李志斌. 中国式现代化: 特征、挑战与路径[J]. 管理世界, 2022(11): 29-43.
27. 韩保江. 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问题[J]. 党的文献, 2022(04): 3-13.
28. 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1(04): 4-23.

A New Open Outlook of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LING Yong-hui

(Institute of Yangtze Industrial Economic, Nanjing University 210093)

Abstract: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 large article rich in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al research topics, which highlights the new open outlook of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Based on the dual-circulation attribute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new concept of open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t economic dimensions an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s the new open outlook of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t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in line with Marx's theory of capital cycle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theory of world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hich has a deep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new concep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ld concept of openness in the past development stage,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openness, domestic market scale advantage, high level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clus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he high level op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hould be expanded and synergistically promoted from five important dimensions: level, field, scope, space and order. Practicing the new open outlook of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The New Open Outlook of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